

# 觉醒与转向:五四时期先进青年 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历史过程考察

■ 张治银

(中央团校 科研与智库工作部,北京 100089)

**【摘要】**五四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均意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批判封建制度、破除偶像崇拜,倡导人人平等,深入群众生活,服务凝聚群众,创建群众团体,尝试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他们真正深入群众,用实际行动吸引群众、唤醒群众、服务群众,实现了自身情感的彻底转化。五四时期先进青年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历史启示我们:要不断在实践中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坚持在实践中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要不断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关键词】**五四时期 先进青年 人民群众 情感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sup>[1]</sup>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唤醒并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写了历史。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是怎样找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呢?

## 一、“主义”传播:开始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

近代中国饱受欺凌,无数仁人志士探寻救国良方。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他们想依靠西方的技术、制度来挽救中国的危机,但种种探索均归于失败。到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译介传播西方的思想。他们传承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等观念,开始在中国传播种种“主义”。

### (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促使青年开始关注劳工群体

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民主思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冲破了封建主义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禁锢。也正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思想解放,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均未能得逞。然而,诚如孙中山所言:“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

收稿日期:2022-03-02

作者简介:张治银,中央团校科研与智库工作部副主任、副教授,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研究”(课题编号:2019MZD017)、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从认知到信仰: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的机理研究”(课题编号:21TZTSKB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sup>[2]</sup>。广大人民群众未能真正组织发动起来,也未得到真正的革命训练,所以辛亥革命失败了。

“劳工神圣”的口号深入人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派遣劳工的方式参与进协约国阵营,跻身战胜国之列。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到中央公园演讲,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蔡元培的演讲传递了两层含义,一是劳动光荣。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sup>[3]</sup>蔡元培将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均称为劳工,提出用自己的劳动服务社会都是神圣和光荣的。二是不劳而获可耻。他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sup>[4]</sup>不劳而获,靠剥削他人而生,是可耻的。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提出的“劳工神圣”口号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传播开去,“劳动光荣”“劳工神圣”的理念深入人心。

### (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改造社会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

主张用教育来改造社会。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建立一个“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的社会。但他们实现美好社会的方式比较特殊,“第一、他们不赞成暴力,希望平和的造成新秩序来;第二、他们相信人类,信任人间的理性,等他醒觉,回到正路上来”<sup>[5]</sup>。正如毛泽东所说,“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sup>[6]</sup>。无政府主义者渴望通过教育的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根本改造,这种观点在近代即破产了。但这种观点迎合了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其空想的成分又与人民群众对和平的向往和未来美好社会的幻想相契合,一时吸引了众多拥趸者。

主张“工读主义”。“工读主义”认为,“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一面劳力,一面劳心;终身工作,终身读书”<sup>[7]</sup>。1919年底,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支持下,王光祈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团员们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主要从事“石印”“素菜食堂”“洗衣服”“制浆糊”“印信笺”“贩卖商品及书报”“装订书报”“制墨汁及兰墨水”等工作,“每日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sup>[8]</sup>;由团员做工的收入供给团员的衣食住行、教育、医药、书籍等费用,以解决青年“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sup>[9]</sup>。上海、天津、南京、广东等地纷纷组建工读互助团,吸引了不少青年参与。由于在经济上不善经营,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使青年认识到,“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sup>[10]</sup>,”“坐在家里是不成功的”<sup>[11]</sup>。

主张到乡村去。工读互助团在城市里维持不下去,青年就将希望寄托于农村,主张到乡村开辟一方净土,主张新村运动的青年“(一)厌弃都市;(二)豢养的生活过意不去;(三)精神劳动使躯体偏枯,并且是一个狡猾的遁逃者;(四)把局部改造作改造的模范”等到乡村实验一番,结果却发现,“(一)非地主不能组织新村;(二)非有全付工具或和工具相等价值的现金不能组织新村;(三)非大部分依赖本来务农的农民不能组织新村;(四)非有健全的与湿、热能抵抗的身体不能作为组织新村的成员”<sup>[12]</sup>。主张到乡村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再以乡村理想社会来感染、转化统治者,进而实现对全社会的改造,这种想法最后也破产了。

###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初兴

强调劳动和劳动者的重要性。李大钊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

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sup>[13]</sup>他还指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sup>[14]</sup>李大钊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据张浩回忆,他原本在湖北乡下做工,觉得“做工是下等人”,有钱人家都不敢去的。受了林育南、恽代英等人的鼓舞,他就“以做工为光荣”,也不怕别人笑话“乡下人上街”,大胆到上海工厂做工去了<sup>[15]</sup>。五四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全国范围广泛传播,影响了广大青年。

强调要深入民众、启发民众、唤醒民众。陈独秀、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后,已深刻认识到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陈独秀指出:“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sup>[16]</sup>他还说:“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sup>[17]</sup>李大钊则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sup>[18]</sup>,“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sup>[19]</sup>。陈独秀、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服务民众、唤醒民众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青年。

主张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一批先进青年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sup>[20]</sup>。因此,毛泽东提出要通过行业、职业等民众的小联合进而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到1925年毛泽东用阶级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他的观点就更清晰了:“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做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sup>[21]</sup>。这一时期的先进青年已经能够区分阶级,主张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联合民众、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了。

## 二、青年实践:尝试与人民群众相结合

从三民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种种“主义”均意识到了人民群众中蕴涵的巨大能量。“劳工神圣”“五一节万岁”“到民间去”“民众大联合”等口号深入人心,宣传发动群众的手段层出不穷,试图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时成为时代的潮流。随着“主义”的传播和实践的深入,广大青年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也经历了由浅入深、逐渐接近历史规律的过程。

### (一)批判封建制度,破除偶像崇拜

猛烈批判封建制度。陈独秀认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sup>[22]</sup>批判封建制度,为民主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

打破心中的偶像崇拜。朱执信提出:“故偶像打破者,不使人以一种事实为偶像,即对于一切事实,皆以一时的对人的为评价,而不容为永久的绝对的评价。而崇拜偶像者则反之,神圣不可侵,即偶像之标帜也。”<sup>[23]</sup>朱执信进而列举了对规约之结果、研究之成果、道德、规制、宗教信条等

的崇拜,提出“苟其观察之人,舍去神圣不可侵一种态度,以凡百事实,置于均等价值之下研究之,则吾人不能遽指为偶像,而豫蔑视之也”<sup>[24]</sup>。破除心中的偶像,进一步解放了青年的思想。

## (二)倡导人人平等

官民平等。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到1917年之前,学生中仍然有“举人、秀才出身的”。他们“管校内工友称‘听差’,工友称呼他们为‘老爷’”,来上学时“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对研究学问毫无兴趣,读书就是为了做官。”<sup>[25]</sup>这时的北京大学,实际是官僚士绅及其子弟获取资历的培训学校,充满着官僚习气。蔡元培到校第一天,即“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回应迎接他的校役们的行礼,“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们大为惊讶”<sup>[26]</sup>。

师生平等。蔡元培还让学生将对学校的建议由呈文改为公函,并将学生的建议登载到《北京大学日刊》上,有可行性的,则督促职员立即实行。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学生对于学校就不再有所隔阂,那些向来喜欢对学生摆架子的职员也摆不成架子了”<sup>[27]</sup>。

男女平等。晚清时期,中国开办了一些女子学校,但男女不能同校。蔡元培在全国高校首推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1919年9月蔡元培答记者问时说:“余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招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在蔡元培的推动下,1920年2月王兰、奚湏、查晓园三位女性获批进北大旁听,3月又有6名女生获得入学旁听许可。此后,全国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sup>[28]</sup>。

中外平等。据许德珩回忆,当时北京大学的外国教员主要是由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来的;几个外国教员懒散,按照合同被辞退了。一被辞退的英国教员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干预,朱尔典放出话来说,蔡元培“不要再做校长了”<sup>[29]</sup>。蔡元培坚决顶住了压力。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是西方列强把持和操纵着的。蔡元培坚持中外平等,裁撤不合格职员,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 (三)深入群众生活

五四时期,青年从书斋和大学的围墙里走出来,到人民群众中去。以1919年3月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为例,讲演团具函报告京师警察厅,“定于春假后每逢星期日在京中各相当地点由团员中择人分别讲演”<sup>[30]</sup>。讲演起初借用京师学务局在北京城东南西北四城宣讲所进行。“本月三日至五日,每日下午一时至五时,在东便门内蟠桃宫讲演。是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而其听讲者之踊跃,实出乎意料之外。”<sup>[31]</sup>到年底,讲演团号召团员“除了到四城讲演,还应当随时到街市上去讲演”<sup>[32]</sup>。1920年3月,讲演团决定举行“农村讲演”,“非团员亦可加入”<sup>[33]</sup>。讲演活动就深入到“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北京郊区工厂和农村了<sup>[34]</sup>。

## (四)服务凝聚群众

倡导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之前,官方通行的文字工具为文言文,而广大群众日常生活所用的为白话文。少数地主和官僚凭借文言文垄断了文化资源。人民群众看不懂、听不懂文言文,也就丧失了学习和掌握文化的机会。五四时期的青年大力推行白话文,还群众以学习文化知识的工具,使得文化启蒙成为可能。

传播文化知识。五四时期成立的众多社团都以面向群众传播知识为己任。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宗旨为“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sup>[35]</sup>。1919年4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刊载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4月3—5日的讲演题目。4月3日的讲演题目有“平民教育讲演之意义”“如何求幸福?”“勤劳与知识”“大家都受教育”“赌博之害”“做一件事当一件事”“勤劳”“改良家庭”“公德”“念书的利益”“人生之要素”“空气”“我和大家的关系”等。三天讲演题目的设置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呈现出由个人向国家、由生活常识向政治知识普及的趋势<sup>[36]</sup>。

办学办书社。五四时期的青年服务人民群众的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创办各类教育机构和  
文化书社。1919年秋,恽代英发起成立武昌利群书社。正如《互助》杂志刊文介绍的那样,利群  
书社“是一个营业的机关,是一个文化运动的场所,是一个修养会社的结晶体,是一个社会服  
务的共同生活的雏形”<sup>[37]</sup>。利群书社培育了林育南、李求实、萧楚女、施洋、蒋先云、张浩等多位党  
史名人,还对湖北周边省份革命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1920年7月初,毛泽东经过武汉,“与利  
群书社创建人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sup>[38]</sup>。7月31日,长沙《大公报》发  
表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文章提出,要“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实青年及  
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sup>[39]</sup>除了长沙、衡阳,安徽宣城、安庆、芜湖,四川泸州等地教育界、学  
生届也受到利群书社的积极影响,“感觉必须有一次革新运动”<sup>[40]</sup>。1921年1月,邓中夏等人在  
长辛店机车厂附近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全国  
各地书社、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储备了大量人才。

#### (五)创建群众团体

五四时期的青年在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认识到组织的重要性。恽代英说:“天下事  
决非一个人所能做成,利用群众亦不可望以一人手足掩天下耳目”,所以“在大群众运动中,总  
少不了进取纯洁的小组织”<sup>[41]</sup>。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创办了种种组织,训练队伍,服务群众。

五四运动期间青年组建了众多组织,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是学生救国会。1918年5月  
北京、天津部分学生代表2000多人到总统府请愿后,组建了学生救国会。同年暑假,学生救国  
会派许德珩、易克嶷到全国各地联络“以通声气”。两人分别走访了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  
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团体,联系了张太雷、恽代英、方志敏、张闻天、沈泽民等青年代表,拜访了  
邵力子、黄炎培、孙中山、冯玉祥等社会名流,北京学生救国会“与各方面声气相通”,几乎成了  
“全国性的学生团体”<sup>[42]</sup>。二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6日,北京大学发  
起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以加强“对爱国斗争的领导”。5月19日,北京中等以  
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罢课,反对巴黎和会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决  
定扩大运动,派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呼吁一致行动”<sup>[43]</sup>。  
先前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为争取全国学生组织起来行动起到了重要铺垫作用。三是全国学  
联。1919年6月16日至8月5日,来自全国各地及留学日本的学生代表60余人在上海召开第一  
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学联章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全国学联“以  
联络感情、昌明学术、促进社会、辅卫国家”为宗旨,“与各地分会互通信息、一致行动,统一了全  
国学生运动的步骤,加强了全国学生的团结,当之无愧地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指挥中心”<sup>[44]</sup>。  
四是学生秘密行动小组。五四运动前夕,以北京国立八校学生为主组建了秘密行动小组,小组  
开会认为要想“政府罢免曹、章、陆”,“收回胶济铁路”,“一般的搞搞游行,是根本不可能的。要  
采取暴力的行动”。秘密行动小组推举互孙、海潮、纵宇等为负责人,安排天放、雨溟负责探查  
卖国贼的住址和进出路线,赓甫、澄宇等到照相馆辨认卖国贼照片,大会前一天安排专人控制  
主席台传声筒、前排掌旗引导队伍行进方向、搭人梯进曹宅并负责放火<sup>[45]</sup>。没有秘密行动小组  
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很可能就只是一场学生游行活动,难以扩展至全国并产生重大影响。五  
是童子军。五四运动期间,少年儿童也被发动起来,组建了童子军。“各校大中小学生,咸持白  
旗一方,沿途演说。尤足动人者,如童子军,各束装荷棒,维持秩序。”<sup>[46]</sup>童子军负责维持秩序,  
兼参与游行和演说,在运动中得到了锻炼。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与工农商界相结合,产生了工农商学相结合的组织。一是商学联合  
会。为了抵制日货,四川省学联主动团结四川总商会,“联合组织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抵制仇  
货的工作”。商学联合会协商,“由总商会负责保证,限期登记并缴出所有仇货”,掀起五四运动

在成都的最高潮<sup>[47]</sup>。二是商学工报联合会。六五运动后,上海学界、商界、工界相继罢工,上海组建商学工报联合会并“公议对内对外宣言”,致电各省“卖国贼存在一日,商工学界即辍业一日,誓不反顾,乞与应援。”<sup>[48]</sup>三是救国十人团。“救国十人团”组织由北大事务部主任李辛白首创,他刊印了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组织起来,数量由十而百而千而万递增,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的爱国要求。五四运动爆发后一两月之间,“北到吉林,西到四川,南到广西,几乎全国大中城市都产生了十人团组织”<sup>[49]</sup>。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中也运用了这个组织形式。刘少奇、李求实在总结安源俱乐部组织概况时说:“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即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各该处十代表选举之。”<sup>[50]</sup>

五四时期,青年创办了众多的社团组织。一是普遍意识到组织团结的重要性。《互助》杂志刊文指出:“我们最急的是求团体意识的形成。”<sup>[51]</sup>这本刊物还发表了《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宣言,强调:“朋友的不了解,每每是金钱离间了他。社会的事业要最能彼此了解的一些人才能做下去”,“我们盼望永远避免金钱的离间,做一个最能服伺社会的团体”<sup>[52]</sup>。为了增进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利群书社定期开会商讨事务,议决内部日会“每人简单报告一日的过失、心得”,有多余时间,则“指定两人详谈他自己家世、环境、过去生活之影响于他现在性行品格的”<sup>[53]</sup>。二是拟订社团宗旨。恽代英说:“我们要做一点事,不可不先结一个死党,要结一个死党,不可不先有明确的公共的目标。”<sup>[54]</sup>恽代英所说的目标就是社团的宗旨。新民学会、互助社、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等众多社团组织无不公布了自己的宗旨。三是严格社团规约。互助社颁布戒约八条,“(一)不谈人过失。(二)不失信。(三)不恶待人。(四)不作无益事。(五)不浪费。(六)不轻狂。(七)不染恶嗜好。(八)不骄矜。”宣布戒约为社员“每饭不忘者也”<sup>[55]</sup>。四是严格规范加入组织程序。新民学会规定会员加入的程序为“经长时间的考察,五人的介绍,评议部的通过,并通告全体会员”<sup>[56]</sup>。五是注重对少年的培养。蔡和森说,“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造幼龄之小学生”,以图“远大之举”<sup>[57]</sup>。

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晚清以来,办社团、建政党逐渐成为一股潮流。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何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李大钊说,“改革的事业,亦断非一手一足之力,自然还要靠着民众的势力”;“没(有)经过民众运动的人民,团体的训练是不会发达的;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中国“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组织“强固精密”,注重成员“团体的训练”<sup>[58]</sup>,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五四时期,先进社团组织训练成员如何服务人民群众、如何过组织生活,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人才储备。在李大钊等人的大力倡导下,北京、上海等地相继创办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

### 三、情感升华:将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能够依靠人民群众开创历史伟业,根源于他们在服务群众的革命实践中对人民群众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在服务群众的革命实践中了解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从而放弃了原有的信仰,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

#### (一)真正深入群众

五四时期的先进青年与工农群众之间原本有着阶级鸿沟。五四时期的中国处在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是被地主阶级和官僚所垄断的。以当时北京大学学生的成分为例,许德珩回忆说:“他们大多是官僚地主子弟,很多人上学一年要花千把块银元,有的人一年要花三五千块银元”<sup>[59]</sup>。而这一时期的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据1919年3月李大钊所作的调查显示,河北唐山煤厂工人每天工银只有二角,骡马每天生活费为五角;死一匹骡马,资本家要损失百元,死一个工人,资本家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工人的命不如骡马<sup>[60]</sup>。工人生活尚不能维持,是无力去学校学习文化知识的。正是这种社会阶级鸿沟的存在,当先进青年走到工厂去的时候,工人对大学生持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大学生是金枝玉叶,将来为官做宦,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工人的事还是让工人自己管,莫让学生们插手为好。”而当时的官僚政客大肆宣扬学生是“过激党”、是来“煽动工潮”和“捣乱”的,更加剧了工人对学生的不信任<sup>[61]</sup>。先进青年与人民群众相结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深入工厂农村,消除工学界限。一方面,先进青年深入工厂农村。邓中夏带着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员到长辛店去讲演,路过的老人议论道,这些大学生“一出学堂门就都要做官的”。工人史文彬听了反驳道:“你见过哪个做官的出一身汗,闹一身土,跑到这乡下地面来跟咱讲话?”<sup>[62]</sup>郊区和乡村演讲吸引了大量群众,也改变了工农群众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另一方面,先进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开展各种活动。据罗章龙回忆,不少同学分别到长辛店、丰台、南口、石家庄,甚至更远的地方调查访问,了解工农的生活疾苦,“召开工学座谈会,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等问题”<sup>[63]</sup>。很快消除了工学界限,消除了工农群众对知识分子的偏见。

## (二)用实际行动吸引群众、唤醒群众、服务群众

不惜坐牢以唤醒群众。1919年6月1日起,北京学生背着被子上街演讲,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如果军警来捕就让他们捕;如果第一天出发的学生全数被捕,第二天就用加倍的人数出发讲演;如果再发生同样的情形,第三天再加上一倍,直到北京二万五千多学生和广大同情学生运动的市民全数捕尽为止。”<sup>[64]</sup>最后监狱容纳不下,北大三院、北大理科都被用作临时监狱关押学生。大批学生被捕,唤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心。

满足工农群众实实在在的需求。邓中夏等人了解到长辛店机车厂工人子女有上学的需求,就组织捐款,在长辛店大街当浦口胡同口租了“三间平瓦房”,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学校“白天教工人的孩子,晚上教工人”<sup>[65]</sup>。教员给工人讲文化知识,讲工人受苦受难的根源,讲摆脱苦难的方法。工人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

采用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五四时期的青年采取了游行、演讲、播放留声机、呼喊口号等多种形式吸引工农群众。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街头演讲,“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宣讲办法,携带一面小铜锣,到人多而适当的地方,主讲人站得高一点,另一个人打起锣来,于是就开讲起来”<sup>[66]</sup>,吸引了众多群众。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大学的师生捐款几百元,“买了几万个馒头,上面盖着红戳子是‘劳工神圣’四个字及其他成语”,“分发于北京各平民”<sup>[67]</sup>。“劳工神圣”的口号得到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工农群众对先进青年产生感情。先进青年用实际行动服务工农群众,感动了工农群众。年轻的教员们抛掉大学的学业,来到劳动补习学校、挤住在小房里。他们“一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饭,还省下几块钱来买茶叶糖果,好招待工人来学校里座谈。”青年教员“这份儿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动了”,工人“也不再把教员们当成一般穿长褂儿的先生看待”,常有工人请教员到自己家里吃饭喝酒;每到星期天,工人就挤满了补习学校,“一院子唱唱闹闹满热闹”<sup>[68]</sup>。工农群众对先进青年产生了感情,逐渐接受了先进青年传播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开始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队伍里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员。

### (三)自身情感的彻底转化

自主的选择。何长工回忆在长辛店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学习时说,我们“脱下知识分子的长衫,穿起了工人的衣服,和工人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朝夕相处”,在劳动过程中既接受了劳动锻炼,又接受了“工人阶级思想感情的熏陶”<sup>[69]</sup>。何长工和一批有志先进青年正是因为深入工农群众生活,在接触、服务工人的过程中对工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自身感情的变化又得到工人的及时回应,所以在五四运动过程中得到了工人的大力支持。工人支持青年学生的革命行动,在学生带领下“一块儿罢工”<sup>[70]</sup>。不愿意去接近工农群众、不能深入工农群众生活,是不可能对工农群众产生感情的。

工农群众的影响。毛泽东曾回忆对人民群众感情的变化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直到后来工农群众在一起,“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sup>[71]</sup>。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邓中夏等先进青年深入工农群众,服务工农群众,与工农群众在感情上打成一片。他们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实践中,不断转变对人民群众和社会的认识,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

## 四、当代启示:到人民群众中去

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毛泽东说,衡量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sup>[72]</sup>。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感情,并能将这种感情上升到毕生的信念和人生信仰。

### (一)要不断在实践中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青年只有不断深入实践,才有可能增长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是难以成大器的。”<sup>[73]</sup>新时代青年需要不断加强科学实验,努力在专业领域实践中检验自己对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断加强生产实践,努力在生产劳动和工作领域积累经验、锤炼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断加强社会关系实践,努力处理好人际关系,增进对同志和同事的理解信任,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增进组织团结。

### (二)要坚持在实践中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青年只有深入群众,才有可能产生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sup>[74]</sup>新时代青年要想建功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新时代青年在学好理论知识的同时,要学会从书房和学校里走出来,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比如参与疫情防控、参与各种志愿服务活动,在服务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 (三)要不断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转化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青年只有不断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升华为信仰,才有可能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不至于迷失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成坚定理想信念,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砥砺、经受考验。”<sup>[75]</sup>人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坚定理想信念是一辈子的事。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根本指向都是要为

为人民服务。没有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首先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sup>[76]</sup>新时代青年要善于培养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善于在人民群众的哺育和滋养下茁壮成长,不断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升华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落实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中去。

## [ 参 考 文 献 ]

- [1][74]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
- [2] 孙中山:《建国方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01页。
- [3][4]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464页。
- [5][12] 张允侯 殷叙彝 洪清祥 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4、191页。
- [6] 《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 [7][8][9][10][11][30][31][32][33][34][35][36][62][65][68] 张允侯 殷叙彝 洪清祥 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24、373-374、380、420、422、138、142、159、161、163、138、142-144、257、263、266页。
- [13][14][19][58]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09、174、270-271页。
- [15][47][70]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五四运动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07、131、61页。
- [16][17][22] 《陈独秀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4-135、163、133页。
- [18][60] 《李大钊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316页。
- [20]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313页。
- [2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载《中国农民》,1926年第2期。
- [23][24] 朱执信:《神圣不可侵与偶像打破》,载《建设》,1919年第1卷。
- [25][26][27][29][42][43][59][64] 许德珩:《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20、20、21、40-42、60-61、19、65页。
- [28] 萧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8-79页。
- [37][40][41][51][52][53][54][55][56][57] 张允侯 殷叙彝 洪清祥 王云开:《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4、206、170、132、136、199、182、123、20、14页。
- [38][3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 [44] 赵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国学联及其学生运动述略》,载《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45][66][67]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回忆五四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43-44、23、65页。
- [46] 杨尘因:《“六三”运动在上海》,载《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第1册,内部发行1957年,第55页。
-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页。
- [49] 小野信尔:《救国十人团运动研究》,殷叙彝 张允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 [50] 中共萍乡市委《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编纂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 [61][63] 罗章龙:《记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 [69] 何长工:《难忘的岁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 [71]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 [7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7页。
- [73][75]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2日。
- [76]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载《人民日报》,2022年3月2日。

(责任编辑:张 丹)